企业家日报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8　邮发代号:61—145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刘涛雄 黄文夫 启文 赵红 李千 吴明伏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刘涛雄 王茂战
主编:管益忻
常务副主编:启文　副主编:白卫星
编辑部主任:廉明　编辑部副主任:刘立华
主编助理:方芳

经济学家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全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葛志荣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康 江春泽 金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伟 茅于轼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杰
吴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第 140 期 (总第 252 期)　2016 年 3 月 18 日 星期五　丙申年 二月初十　投稿邮箱:jjxjz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刊订阅方法: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

——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 2016 年年会

本报讯　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 2016 年年会,2 月 19 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5 号楼隆重开幕。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

会议由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主持。

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吴敬琏、刘鹤出席会议。

论坛成员白重恩、蔡昉、曹远征、樊纲、管涛、贺力平、胡鞍钢、李波、刘世锦、李晓西、李扬、隆国强、楼继伟、钱颖一、盛洪、宋国青、宋晓梧、汤敏、汪同三、王一鸣、夏斌、许善达、杨伟民、易纲、周其仁、周小川,论坛荣誉成员茅于轼出席年会。

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丁学东、段永基、郭翠萍、刘光超、刘晓艳、刘志硕、平凡、秦朔、王小兰、王志全、赵民、赵伟国、周远志、朱云来出席会议。

部分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特邀专家和嘉宾应邀出席了论坛年会。

下午 14 时,主持人吴晓灵宣布:"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 2016 年年会现在开幕"。她首先代表 50 人论坛,向到会的各位论坛成员、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和各位特邀专家、嘉宾,向前来采访年会的媒体朋友们表示新春的祝福和热烈的欢迎!

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代表学术委员会,向大会报告了 2015 年论坛工作,对 2016 年工作做了初步安排。

根据会议议程,周小川、 杨伟民、楼继伟、钱颖一、易纲、吴敬琏先后作主题发言。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刘世锦、王一鸣、蔡昉、李扬就实体经济去产能、房地产去库存、全面降低成本和化解金融领域风险和去杠杆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随后,与会人员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近 60 家中外媒体派出 100 多名记者现场采访。本期选编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根据大会录音资料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以飨读者。

(论坛秘书处)

关于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实践

■ 周小川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首先,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重要,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从我的角度来讲,跟我的领域关联不是特别大——我是从作为经济研究者的角度来发言的。关于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实践,我说说自己的体会。

首先我个人最早进入经济学研究是从搞数学模型出发的,从我接触的各类数学模型来看,最终结构性的问题和价格问题是出于原始对偶关系,也就是结构问题,特别是实物供给和需求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反映的就是价格问题,所以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当然必须有一个有效市场假设。

结构改革或者说结构调整也是价格改革和价格调整。这是具有等效性的议题。这里要有一个例外,市场在有一些环节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说在市场失效的环节;还有一些,由行政主导的结构性问题和结构性调整。应该说由于我们国家是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因此从思维的角度比较倾向于较多看到市场无效的环节或者市场失效的环节,在市场失效的环节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发挥更好的作用。所以就涉及到有关的讨论,哪些环节市场更加有效,哪些环节市场会无效。

那么从结构性问题来讲,大家一般先看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产品市场,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是有效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变动也决定供求关系。结构的调整也需要价格信号提供激励,没有激励的结构调整也是很困难的。这些都是大家都熟知的东西,在产品价格里面,可能有个别的产品市场调节不了,特别是有一些重要的产品。但是从实践来看,我们最后发现也不见得政府主导的定价能够做得更好。

我举一个不一定正确的例子,比如说成品油,这么重要的产品可能政府会考虑更周到一些,但是经过几轮演变,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的成品油的定价,最后不过就是在国际市场价格上加一个滤扩期(音译),也就是延迟 20 天左右,过滤掉过度的高频波动成分,最后还是跟随国际市场价格。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总之也很难说明即便某些很重要的产品,是不是就是说市场决定的价格可能是不行的。

更复杂的问题是要素价格。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的要素价格,人力资源、资本、土地,我认为原则上来讲,价格和实物供求关系也还是成立的,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一些,这些复杂的因素应该有一些额外的考虑。但总的结论应该是不变的。这也包括大家所关心的像利率、汇率这些问题,也是供求关系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如果单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汇率更多地是一个贸易加权的供求关系,但是如果说后来随着国际经济发展,资本投资和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外汇的价格也更加反映,更加像要素价格,所以也可以按照要素价格来进行考虑。

下面我想说的,之所以说市场有时候是无效的,大概有一小部分情况下市场是无效的。那么这个无效,过去传统的经济理论主要是外部效应,存在外部效应,所以市场决定的价格可能存在误导。有广义的外部效应和狭义的外部效应。一般来说大家都理解,像制造环境污染,损害环境之类的是最典型的外部效应的例子。有的人把宏观的因素考虑到外部效应里面,这是分类问题。总之来说,外部效应是一个重要的需要研究的领域。

最近国际上做的越来越多的是外部效应内在化,就是把它内部化。典型的就是像污染问题,或者再具体一下,比如说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排放问题的内在化,要把它的外部效应事先打入使用能源的或者制造污染的排放的成本里面。因此也就是说你要排放二氧化碳,你要先买配额,你把消化二氧化碳和吸收二氧化碳的钱先付了,找别人做吸收或者减排的工作。这样的话,二氧化碳是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有不少国家,对于任何产品的出厂和销售,必须事先把它未来形成的垃圾处理费用打到里面;把垃圾费用打到里面去的时候,外部效应实际上也内在化了,处理垃圾的时候,就不用额外出钱了。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汽车的铅锌电池。即便市场有无效的情况下,特别是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办法能够使价格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说明不见得其他的结构性政策能够比价格政策更好。我只是从这一个角度说明,所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也是听刘鹤主任反复讲过,就是消除价格扭曲。我们当前体制中存在很多价格扭曲,把这些价格扭曲去消化掉,改革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结构性改革了。

另外一个强调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来源,我认为跟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克服危机和争取复苏过程中,过度依赖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关)。由于很多国家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小,过去债务比例高,赤字已经高了,所以有一些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因此近两年在国际很多场合在讨论,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问题。

另外可能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过头,大家就会讨论这个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会思考,实际上应该更加侧重于对供给侧的政策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讲,供给侧和需求侧应该也是相互配合的。

最后我想讲的是,结构性政策在当前全球化经济情况下,是和对外经济关系非常重大的。在对外经济的题目中,重要的议题就是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转移。随着价格体系的变动,特别是要素价格的变动,比较优势就会发生转移;比较优势发生转移,完全基于价格体系的变化,特别是相对的变化。有一些比较优势转移,包括某些附加价值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必然会转移出去。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究竟转移还是不转移取决于结构性政策,取决于你的发展战略。

我感觉从古典经济学角度来讲,比较优势究竟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产能或者产能过剩或者产能转移是什么关系。中国跟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经常说我们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我生产的你没有,你生产的我没有,正好是互补的,咱们正好可以加强合作。但是古典经济学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这么说的,即便没有资源禀赋也会通过分工,使得一个国家可能生产一个产品会有更高的产能,同时有更高的产出,那个国家生产另一种产品有更高的产能和产出,表明生产技能和生产设备的各种东西的汇聚。邻近两个国家资源禀赋差不多,可能一个国家多生产帽子,一个国家多生产鞋,然后相互交换。从本国市场容量角度来讲,其实都是产能过剩,你生产的帽子,你这个国家的人根本没有那么多,你就是消耗不掉。所以单从本国供求关系来看是否产能过剩可能还是有一定问题的。

如果说,能够足够开辟国际市场,而且贸易政策不存在过度扭曲的话,产能过剩的衡量可能需要有另外一些考虑。对中国来讲,我觉得中间可能有外部效应的因素。如果我们把生产留给自己,污染也留给自己,可能是外部效应。我特别强调,在两高一资环节的产能过剩。因此这个也导致处理产能过剩和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也就是结构政策和贸易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产能转移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可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就是运输成本相当高的成本,运输成本和定价值相比相当高的这类产品,不太适合通过贸易交换获得,如果有产能的话,可以把产能输送出去在当地生产。但是换一种情况也不一定,比较优势转移和产能转移,也要更多的和就业,和创造就业以及保持就业水平相联系。

这些都是我脑子里想的比较典型的结构性问题,我也希望能够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提供一点理论性的思考。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

■ 杨伟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补,我讲一下如何落实的问题。落实五大任务,最主要的就是按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五个搞清楚,来做好下一步工作。

第一情况要摸清,搞清楚情况是什么,现状、问题,以及产品问题的原因要理清楚。我们对现实状况有一定了解,但是还不是十分精确,比如说钢铁煤炭产能到底有多少,其中僵尸企业有多少,占多大的产能。处置这些僵尸企业带来多少不良资产,不良贷款;涉及到多少职工,安置这些职工的再就业、保证基本生活需要多少钱?情况搞清楚,还应包括搞清楚问题是什么,主要矛盾在哪里。我们现在有一些政策、规划、方案,列了一堆问题,但是主要问题没有搞清楚。搞清楚问题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真正解决问题。如果原因不清楚,出台的政策可能南辕北辙,甚至适得其反。比如说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农民工对户籍制度改革反应比较平淡,究竟原因是什么?是户籍制度还是居住证制度,还是居住、上学、农地等等方面一些制度条件跟不上?再深入一步,比如说农民工没有房子,没有居住条件,那又是为什么?是因为农民工没有加入公积金,是因为贷款难还是因为房价贵,等等。各地情况也不同,都要具体地分析。

第二目的要明确,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把握好目的和手段,防止就事论事,甚至本末倒置。比如说处置僵尸企业,最后要起到减少过剩产能,稳住 PDI,改善优质企业生产经营的状况等等这样一些效果,但如果仅仅把停产的企业关了,消了号,但是过剩产能没有实质性地减少,就没有达到目的。过去我们搞过上大压小,企业数量是少了,但产能却增加了。很多领域都有这些情况,前一阶段媒体说工信部处置了汽车行业的僵尸企业,其实就是收回了本来多年就没有生产汽车企业的许可证,整个汽车行业的产能一点也没有减少。不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把前几年的关停落后产能也说成是供给侧改革,说成是处置僵尸企业,好像任务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这是有偏差的。

比如说人口城镇化,现在大家都在提倡,相比土地城镇化是个进步。但是人口城镇化最重要的是人口在就业地落户和居住,而不是在老家等非就业地落户,否则还会存在大量人口就业地与居住地空间的分离问题。对于那些就业地在一二线城市,在当地买不起房子,从而难以体面居住,难以在一二线城市落户的农民工等外来人口而言,解决的途径就是支持他们先租房子解决居住需求问题,有了能力之后再购房。

过去住房制度的改革,中高收入群体通过购买商品房解决居住问题,中低收入群体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解决,困难群体通过廉租房解决。事实上大学毕业生、中等职业毕业生、农民工等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们都是中等收入群体,开始的时候不可能是高收入群体,他们是真正住房的刚需,所以为他们进城落户创造居住条件,必须要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此建立住房的租赁市场,为此就要有提供租赁市场住房的主体,就是房东,为此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以住房租赁为主业的专业化企业、物业服务企业这五类企业;还包括鼓励房地产开发商转变经营策略,实行卖房租房并举,使这五类企业成为今后住房租赁市场房源的提供者。这些环环相扣的措施,最终的效果是化解房地产库存,又为农民工落户扫除居住的障碍。

第三任务要具体,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确定的任务要具体化明确而且可操作。当然五大任务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每一项重点任务都可以具体化,如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包括六个方面,七个方面,这些都可以进一步具体化。比如说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还要进一步说清楚降低哪些税费,降低多少,等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减少哪些审批,评估,检测费用等应该一一列出清单,限期完成。处置僵尸企业,当前可以从钢铁煤炭先动手。但产能过剩是全局性的,对火电,电解铝,石化,造船等行业如果听之任之,不久就会变成今天的钢铁煤炭。所以也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对其他行业的僵尸企业进行处置。

第四是责任要落实,搞清楚谁来干。做到可检查可督促能问责,总的原则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以及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的关系。不同的任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不同,中央与地方承担的责任不一样,法律、经济、行政这三个手段使用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在处置僵尸企业当中,中央政府主要是做好顶层设计,对职工安置给予财政补贴,地方政府要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财政补贴和其他各类补贴。地方政府还要负责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对于央企中的僵尸企业要果断采取一些行政性措施。化解房地产库存过程当中,中央政府主要是做好新一轮住房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以及金融财政土地等大的一些方面的政策,主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来办。

第五措施要有力,搞清楚怎么办,用什么政策措施来办。总的原则要符合实际,有效有用有操作性。供给侧改革的许多任务是带有补课性质的,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后遗症。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多,所以我们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等时间窗口非常短,十三五头两三年十分关键,如果没有明显的进展,再遇到国际经济形势的波动,我们今后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大,日子会更难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展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对中央确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态度要鲜明、措施要有力,如果贻误了这个时间窗口,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各个地区,各个部门要从大局全局出发,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财税部门不能因为怕减收就不有力度的降低税率和费率;金融部门不能怕不良贷款显露还继续给僵尸企业放贷;社保和住建不能怕自己掌握的资金减少就不有力度的降低五险一金;国资监管部门不能缩减国有资产的总量就下不了决心处置僵尸企业;电力部门不能因为怕减少自己的利润就不有力度的降低电费;地方政府也不能因为本地的税收和就业以及社会稳定就继续保护僵尸企业。总之各地区各部门,全社会应该行动起来,打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战和歼灭战。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

美联储(Fed)调低了今年加息预测,接近市场对于两次加息、每次 1/4 点的预期。这家美国央行指出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发展给美国前景带来的风险。

美联储在加息问题上转向更具鸽派色彩的立场,使其减轻了与其他央行的步调不一致程度,目前不少央行仍有意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以抵消全球增长走弱。

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在记者会上表示,审慎推进将会"让我们验证劳动力市场仍在继续加强,尽管存在来自海外的风险。"

美国央行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 0.25%到 0.5%的目标范围,继去年 12 月进行里程碑式的加息 1/4 点后,这是第二次按兵不动的会议。

美联储政策制定者调低了关于未来几年上调短期利率的预测,2016 年中值预测从去年 12 月预计的四次加息降至两次。去年 12 月耶伦领导美联储进入逐渐提升短期利率的轨道,但大宗商品和股价暴跌,中国政策制定的杂乱性,以及对全球经济增长趋弱的担忧,让今年的前景变得阴云密布。美联储利率制定者 3 月 16 日未确定下一次加息时机,他们对美国经济表现给予了大致积极的评价,指出通胀有所上扬,劳动力市场正在加强,经济仍在继续适度扩张,尽管海外问题重重。

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虽然市场最近有所改善,"但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继续构成风险"。美国央行还预计,通胀在升至 2%的目标前,中期仍会保持在低水平。

(FT 中文网)